

A SERIES OF BOOKS FOR ALTAIC STUDIES

阿尔泰学丛书

顾问 清格尔泰 主编 呼格吉勒图 双龙

《黄金史》语言

[苏联] M. H. 奥尔洛夫斯卡娅 著

郭守祥 译

白俊瑞 范丽君 审校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目 录

《阿尔泰学丛书》总序	(1)
前言	(1)
概论	(3)
蒙古古书面语及其发展时期.....	(3)
《黄金史》简述	(10)
静词形式	(17)
名词	(17)
格及其意义	(17)
主格	(17)
宾格	(19)
领格	(24)
方位格	(28)
与位格	(33)
凭借格	(38)
从比格	(42)
和同格	(45)
联合格	(47)
双重格形式	(48)
复数	(53)
复数附加成分	(53)
复数使用特点	(58)

形容词	(61)
代词	(64)
数词	(72)
动词形式	(76)
祈使—愿望形式	(76)
第二人称命令形式	(76)
第二人称命令—希望形式	(77)
复数第二人称命令形式	(77)
第一人称意愿形式	(79)
第一人称命令—邀请形式	(80)
第三人称命令—愿望形式	(80)
希望形式	(81)
顾虑形式	(82)
陈述式动词形式	(83)
现在—将来时形式	(83)
带=yu 的形式	(83)
带=m 的形式	(87)
带=mu 的形式	(90)
带=mui 的形式	(90)
带=nam 的形式	(92)
过去时形式	(93)
带=ba / =bai 的形式	(94)
带=luya 的形式	(96)
带=juqui 的形式	(97)
带=t 的形式	(99)
带=mja 的形式	(100)
形动词形式	(101)
将来时形动词	(102)
过去时形动词	(116)
一次体形动词	(127)
带=γci 的形式	(127)

经常体形动词	(130)
持续体形动词	(132)
副动词形式	(133)
副动词 I	(137)
并列副动词	(137)
联合副动词	(147)
分离副动词	(154)
副动词 II	(158)
条件副动词	(159)
让步副动词	(169)
延续副动词	(170)
迎接副动词	(172)
目的副动词	(175)
准备或者引证副动词	(177)
副词和虚词类	(182)
副词	(182)
后置词	(191)
语气词	(201)
否定语气词	(201)
疑问语气词	(209)
强调语气词	(209)
领属语气词	(216)
连接词	(220)
结束语	(222)
缩写词	(224)
参考书目	(225)
审校者后记	(234)
《阿尔泰学丛书》编后语	(237)

《阿尔泰学丛书》总序

自 1786 年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W. Jones, 1746—1794)在印度加尔各答亚洲学会发表论文,认为梵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方面跟希腊语和拉丁语有许多共同点并具有共同来源之后,德国语言学家葆朴(Franz Bopp, 1791—1867)出版了《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和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相互比较》(1816)和《梵语、禅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峨特语和德语比较语法》(1833),为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提出了亲属语言的关系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材料,即开创了“用一种语言阐明另一种语言,用一种语言的形式解释另一种语言的形式”的先河。经过雅各布·格里木(Jacob Grimm, 1785—1863)、奥古斯特·波特(Pott, 1802—1887)、阿达尔贝尔特·库恩(Kuhn, 1812—1881)以及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 1823—1900)、古尔替乌斯(G. Curtius, 1820—1885)、施来赫尔(Aug. Schleicher, 1821—1868)等语言学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比较语言学成为一个新兴的语言学领域得以确立。印欧诸语言谱系树的建立以及形态学的分类都与施来赫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然而,德国语言学家荻兹(Diez, 1794—1876)出版《罗曼族语语法》(1836—1838)之后使比较语言学获得了真正的地位。但是,正如索绪尔批评的那样,这个时期的“比较语法在它的研究中(而且只限于印欧语系语言的研究),是从来不过问它所作的比较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所发现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它完全是比较的,而不是历史的。毫无疑问,比较是一切历史重建所必不可少的条

件。但是单靠比较不能做出结论”^①。

到了 1870 年前后,出现了美国的辉特尼(Whitney, 1827—1894)和德国的勃鲁格曼(K. Brugmann, 1849—1919)等新语法学派的诸多语言学家,他们出版了《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勃鲁格曼, 1886),《印度日耳曼语名词词干结构领域内的研究》(奥斯特霍夫, 1875),《印欧语言比较语法基础》(德尔布吕克, 1886)等一系列著作,开始提出:语言生命的条件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竭力反对以前的语言学家把语言的生命分为史前的增长时期和有史以来的衰老时期,要求用不允许有例外的语音演变规律和类比作用解释语言变化现象,认为语言间的对应只是语言现象的一个方面,比较只是一种手段和重建事实的方法,从而把语言的历史研究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代著名语言学家瑞士学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于 1878 年写出了惊人之作《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并且在巴黎同他的学生梅耶(A. Meillet)和格拉蒙(M. Grammont)等语言学家共同建成了法兰西学派。在他去世以后由他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蔼等整理出版的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之所以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除了它的内容非常广泛之外,是因为在欧洲研究印欧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刻又提出了注重语言结构、系统和功能的研究,还把语言学划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等,奠定了语言学研究较新趋向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这本书的第五编“回顾语言学的问题 结论”中,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和方法进行了阐述。除此之外,梅耶的《印欧语言比较研究导论》(1903)和根据他 1924 年在奥斯陆演讲的稿子修订出版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汉译本,科学出版社,1957,北京)进一步用印欧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成果阐述了历史语言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使得历史比较语言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并使印欧语系学说在语言学界

^①参见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沙·巴利、阿·薛施蔼、阿·里德林格合作编印,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5,北京,第 17~25 页。

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科学的肯定。近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美国学者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的《语言论》(1933)“第十八章 比较法”中也系统述及了通过比较研究语言间的相似成分来确定和区分亲属语言与非亲属语言的方法。并通过对欧洲语言间的比较和重构,证明了欧洲诸语言间的亲缘关系。更为有趣的是,他竟然使用芬兰—乌戈尔语系中的日耳曼语借词作为古老日耳曼语的证据加以利用,进一步证明了日耳曼语的古老形式^①,从而丰富了比较语言学的内容和方法。

印欧语系诸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得到语言科学证明之后,语言学界把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试图应用到其他语言的谱系分类上来。譬如,“阿尔泰语言学理论”就认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洲—通古斯语族诸语言和朝鲜语(有的也包括日语)同属于一个语系,这些语言之间具有同源关系。但是这种假说至今尚未得到语言学界的完全肯定和认同,仍有不少学者持有相反意见或抱有怀疑态度。

其实第一位注意到突厥语、蒙古语和满洲—通古斯诸语言之间具有相似性的人是瑞典军人菲利普·约翰·冯·斯特拉伦伯格(Phillip Johann von Strahlenberg)。他在西伯利亚居住期间,收集了大量突厥语、蒙古语、芬兰—乌戈尔语和其他语言材料,1730年在斯德哥尔摩发表文章,把这些语言概括地称做“鞑靼诸语”(The Tatar Languages)^②。后来,丹麦语言学家拉斯马斯·拉斯克(Rasmus Rask)1834年提出了“斯基泰诸语”(The Scythian Languages)的术语,涵盖的语言包括前述鞑靼语和爱斯基摩语、古亚洲语、高加索语以及古代欧洲的非欧居民的语言等。随着19世纪中叶印欧比较语言学得到空前发展,麦克斯·缪勒1855年提出过“都兰诸语”(The Tulanian Languages)的术语,大体包括前述两位涉及的语言之外还增加了藏

^① 参见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北京,第374~403页。

^② Strahlenberg, Von P. T., Das nord-und Ostliche Theil von Europa und Asia, in-soweit das gantze Russische Reich mit Sibiren und grossen Tatarei in sich begreiffet, ect.

语、暹罗语、德拉维达语、马来亚语等一些亚洲语言。1862年出版的卡斯特伦(Castrén, 1813—1852)把芬兰—乌戈尔、萨摩亚、突厥、蒙古、满洲—通古斯等语言归结为一个语群,叫做“阿尔泰语言”^①,有的则叫做“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例如,德国学者硕特(Schott, 1853)、温克勒(Winkler, 1884)、法国学者索瓦蔗奥(Sauvageot, 1930)、芬兰学者马尔蒂·雷塞伦(Martti Räsänen, 1949)等不少学者支持和从事“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的研究,发表了不少重要著作。就是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中也出现过“乌拉尔·阿尔泰语言”这样的术语(见汉译本第320页)。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语言学家逐渐把乌拉尔·阿尔泰诸语言联系在一起,是因为这些语言之间在语音、语法和词汇等诸多方面具有较多的相似性特征。譬如在元音和谐律、构词结构的黏着性(词干+词缀)、句子的“主—宾—谓”结构、有后置词而没有前置词和冠词、有从属范畴等方面,与印欧语系诸语言相比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随着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的不断深入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间的有些共同性或相似性特征并不能说明它一定是原始语言的特征。索绪尔讲到:“我们已经看到,原始型的某个特征可能在某种派生的语言里已经找不到。反过来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某一语系全体代表所共有的特征竟然是原始语言所没有的。元音和谐(即一个词的后缀的所有元音的音色跟词根要素的最后一个元音发生某种同化)就是例子。在一大群流行于欧亚两洲从芬兰直到中国东北的语言——乌拉尔·阿尔泰语言里,都可以找到这种现象。但是这一极可注意的特征很可能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因此这可能是一个共同的特征而不是原有的特征,我们甚至不能引用来证明这些语言有(大可争论的)共同来源,正如不能引用它们的黏着的特征一样。人们也已承认汉语并不一直是单音节的。”^②理论上我们可以认同索绪尔的论点,但是真正考证乌拉尔—

①Castrén, M. A., Über die Personalaffixe in den altaischen Sprachen, Petersburg, Kleine Schriften, 1862.

②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85,北京,第320~321页。

阿尔泰语言的内在亲缘关系是否存在,还要靠实证科学。乌拉尔语(芬兰—乌戈尔诸语)虽然在某些语音特征、构词方法和句法结构等方面有一定的类型上的相似特点,但在其语音对应规律和同源词汇方面共同性较少,所以把乌拉尔诸语与阿尔泰诸语看做一个语系的学者人数极少。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精通芬兰—乌戈尔语和阿尔泰语言的芬兰学者兰司铁(G. J. Ramstedt, 1873—1950)^①从突厥语和蒙古语的关系着手对阿尔泰诸语言的数词^②和动词构词词缀^③和语音语法特性^④作了有意义的研究。后来他对日语^⑤和朝鲜语^⑥也进行了研究。他不断对阿尔泰诸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工作进行综合整理,写出了《阿尔泰语中的腭音》(1932)、《阿尔泰语言中由动词演化而来的以 -j 结尾的名词》(1950)、《阿尔泰语言中由动词演化而来的以 -m 结尾的名词》(1950)、《阿尔泰语与其他语系的关系》(1947)、《卡尔梅克语辞典》(1935)等论著。特别是由兰司铁的学生本齐·阿尔托(Pentti Aalto, 1917—1998)整理出版的兰司铁的《阿尔泰语言学导论》(第一部:语音学,1957;第二部:形态学,1952;第三部:索引),依靠丰富的第一手语言材料,证明了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洲—通古斯语族诸语言和朝鲜语具有亲缘关系,系统阐述了突厥语

①兰司铁(G. J. Ramstedt, 1873—1950)起初是一位芬兰—乌戈尔学者,他出生在芬兰,芬兰语是他的母语,在大学里学习过匈牙利语,长期在蒙古地区调查和研究过喀尔喀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同时又是一位突厥学家,研究过朝鲜语和日语。他反对把芬兰—乌戈尔语与阿尔泰语看做是一个语系。他的这种观点决非因为缺乏相关语言知识和语言学理论而形成,恰恰相反,这些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给他创造了建立阿尔泰学理论的条件。

②兰司铁:《论阿尔泰语数词》,JSFOu, 23, 4, 1905。

③兰司铁:《蒙古—突厥语动词词根构词学》,JSFOu, 28, 3, 1912。

④兰司铁:《论蒙古—突厥语音史》,I—II, KS, 15, 布达佩斯,1914,第134~150页;III, KS, 16, 布达佩斯,1915,第66~84页。

⑤兰司铁:《阿尔泰语和日语的比较》,《日本亚洲学会学报》,a-d ser. 1, pp. 41~54页;《日语史》,《芬兰科学院会议报告集》,赫尔辛基,1942,第133~144页。

⑥兰司铁发表了《论朝鲜语》(1928)、《朝鲜语的名词后缀》(1933)、《朝鲜语语法》(1939)、《朝鲜语词源研究》(1949)等论著。

族、蒙古语族、满洲—通古斯语族诸语言和朝鲜语在语音与语法方面的内在亲缘关系,从而建立了“阿尔泰学理论”,使得“阿尔泰诸语言”从“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中分离出来,原有的“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一分为二,变成了芬兰—乌戈尔语系(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两个语系。

响应兰司铁“阿尔泰学理论”较早的是1923年以前在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大学工作的波兰学者符拉迪斯拉夫·科特维奇(Władysław Kotwicz, 1872—1944)、俄罗斯学者鲁德涅夫(А. Руднев, 1878—1958)、符拉基米尔佐夫(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 1884—1931)和匈牙利学者尤利乌斯·涅默特(Julius Németh)、冈伯茨(Gombocz)等。除了个别人,他们的大多数和兰司铁本人一样,一开始都怀疑突厥语和蒙古语等“阿尔泰诸语言”之间存在亲缘关系,但后来又逐渐相信这种关系的存在。可以说第一代从事阿尔泰学理论研究的学者除了兰司铁还要包括科特维奇和他的学生符拉基米尔佐夫。虽然说符拉基米尔佐夫基本上因袭了兰司铁的观点^①,但是科特维奇却有所不同。他除了接受兰司铁关于阿尔泰诸语言间存在着一大批共同成分(语法结构、同源词尾、词汇、语音对应关系等)的观点之外,在“阿尔泰诸语言”都来源于一个“共同阿尔泰语”或“原始阿尔泰语”的同源论方面却保留了个人意见。特别是他去世以后出版的他的《阿尔泰诸语言研究》(1953)一书,集中反映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突厥语对蒙古语有过强烈的影响,而蒙古语又对通古斯语有过较大的影响。上述三个语族语言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可能是由于原有的结构相似加上相互接触和影响所造成的结果。

俄罗斯突厥学家巴斯卡科夫(Н. А. Баскаков, 1905—1996)是阿尔泰学理论的支持者。他在其《阿尔泰语系语言及其研究》(1981)中认为:曾经有过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为基础的共同体,而经过历史上的分离,形成了乌拉尔语言和阿尔泰语言。后来阿尔泰语言又经过分化形成了突厥语、蒙古语、满洲—通古斯语、朝鲜语和日语。

^①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列宁格勒,1929;陈伟、陈鹏汉译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西宁。

美国学者鲍培(N. N. Poppe, 1897—1991)是20世纪继兰司铁之后最著名和多产的阿尔泰语言学家和蒙古语言学家。他撰写的《论阿尔泰语言的辅音系统》(1924)、《阿尔泰语和原始突厥语》(1926)、《阿尔泰语言学导论》(1965)、《阿尔泰语言比较语法》(语音学, 1960)、《蒙古语比较研究绪论》(1955)等论著不仅进一步描写了阿尔泰诸语言的概貌,而且进行了相关语言之间的历史比较研究,对阿尔泰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除了上述学者外,各国还有很多有关阿尔泰学方面的学者,他们也都发表过不少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论著。可以说,阿尔泰学研究经过两个多世纪,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阿尔泰语系”的研究还远不如像印欧语系那样已经得到理论上的肯定,还有不少学者怀疑或反对阿尔泰语言学理论。例如本青(J. Benzing)^①、李盖提(L. Ligeti)^②、格伦伯赫(K. Grönbech)^③、西诺(D. Sinor)^④、罗那—塔什(A. Róna-Tas)^⑤等学者做了很多研究之后认为,目前对“阿尔泰诸语言”在语源上是否存在亲缘关系的问题做肯定的回答还为时过早。他们之中,有的先是相信阿尔泰学理论,后来提出怀疑;有的则是起初怀疑阿尔泰学理论,后来开始相信;有的则是既不肯定阿尔泰诸语言间存在发生学上的关系,又不排除存在同源关系的可能

①Benzing, J.,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altaischen Philologie und der Turkologie,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53.

②Ligeti, L., [The Review in Russian of G. D. Sanžeev, Sravnitel'aya grammatika mongolskix yazikov], Voprosii Yaikozīnaniya, 5 (1955).

③Grönbech, K. and J. R. Kruger,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Mongolian, Wiesbaden, 1955.

④D. Sinor: Observations on a New Comparative Altaic Phonology, BSOAS, 26:1 (1963). Denis Sinor: Essays in Comparative Altaic Linguistics,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1990.

⑤Róna-Tas, A., An Introduction to Turkology, Szeged, Hungary, 1991. 《是共同继承的还是借用的?——论阿尔泰语言的系属问题》,陈鹏译自《语言学问题》杂志,1974年,第二期。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秘书处编《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集),1982,第73~96页。

性,提倡做更多的研究之后再下结论。还有前面提到的波兰学者科特维奇^①、英国学者克劳森(G. Clauson)^②和德国学者多费尔(G. Doerfer)^③等学者则把阿尔泰诸语言间的共同成分看做是互借或相互影响的结果,从而认为突厥语、蒙古语和满洲—通古斯语等语言之间不存在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只存在类型学上的相似性。他们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蒙古语和突厥语等语言之间不存在数词的共同性和一些基本词汇的同源性。

人们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和理论证明了印欧语系,同时印欧语系的确立反过来又证明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科学性。随着现代语言科学的不断发展,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不断扩大,从事和关注阿尔泰语言学理论的人也越来越多。1957年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第24届国际东方学会议(2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上决定建立常设国际阿尔泰学会议(The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以来,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国际阿尔泰学会议,截止2003年已经召开46届国际阿尔泰学会议,大大推动了国际阿尔泰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此外,在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匈牙利、芬兰、韩国、土耳其、蒙古等不少国家先后成立了阿尔泰学研究机构或学术团体,有的学术团体还定期召开国际性或地区性阿尔泰学学术会议,创办阿尔泰学研究杂志,在世界范围内阿尔泰学研究日益活跃。

阿尔泰语系语言主要分布在广袤的中北亚地区,也有少数分布在欧洲。操用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人口不包括日本大约有1亿人口左右。究竟有多少民族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语言,由于在划分语系、语族、语言和方言等各个层面上均存在不同观点,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因此难以提供确切的数字。根据多数学者的意见和最新的观

①Kotwicz, W., *Studia nad Yezikami altayskimi*, Wyd. Marian Lewcki, Ro. 16, 1953.

②Clauson, Sir G., *The Case against the Altaic Theory*, CAJ, 2 (1956).

③Doerfer Gerhard: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Bd. I: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Wiesbaden, 1963.

点,阿尔泰语系语言大概有四十多近五十种语言,其中包括:突厥语族语言近二十种(维吾尔语、乌孜别克语、西部裕固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吉尔吉斯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塔塔尔语、巴什基尔语、库慕克语、撒拉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阿尔泰语、图瓦语、哈卡斯语、雅库特语、楚瓦什语和其他一些语言),蒙古语族语言9种(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达斡尔语、东乡语、土族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莫戈勒语),满洲—通古斯语族语言13种(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涅基达尔语、埃文语、埃文基语、赫哲语、那乃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奥罗奇语、乌德盖语等),此外还有朝鲜语和日语等^①。我国阿尔泰语系语言非常丰富,覆盖了整个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各个语族,其中属于突厥语族语言的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西部裕固语、撒拉语、图瓦语等;属于蒙古语族语言的有:蒙古语、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等;属于满洲—通古斯语族语言的有: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等;另外还有朝鲜语。

我国作为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发祥地,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洲—通古斯语族等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及朝鲜语的研究都有较长的历史,涌现了清格尔泰(Chenggeltai)教授、耿世民教授等一批著名学者。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老一辈学者的培养下,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迅速成长。北京、内蒙古、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青海、甘肃等省、市、自治区成为我国开展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出版了《蒙古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共21本)、《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阿尔泰语言学导论》、《现代蒙古语语法》、《维吾尔语语法》、《满语语法》等书。但是从整体上看,多数学者所从事的是单一语言的描写研究或同一语族内部的比较研究,真正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开展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比较研究的成果为数甚少。为了推动我国阿尔泰学事业的发展,为了借鉴国外阿尔泰学研究成果,为了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为了迎接国内外阿尔泰学研究新高潮的

^①这里并没有列举匈奴语、古突厥语、回鹘语、察哈台语、契丹语、女真语等和现代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有密切关系的古代语言。

到来,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阿尔泰学丛书》。这是一个英明而富有远见的决定,是一个学术界值得庆贺的喜事。

《阿尔泰学丛书》将包括:(1)有关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比较研究或相关语言描写研究的著作、译著和论文集;(2)相关语言的文献资料;(3)相关语言或方言的实地调查材料;(4)有关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的信息资料等。该系列丛书将根据情况陆续出版。由于本丛书学术性强、排版录入校对难等各种原因,不免出现各种差错,请读者予以指正。

最后,希望该系列丛书能为阿尔泰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起到参考作用,也希望为我国阿尔泰学的发展、为国际阿尔泰学的进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呼格吉勒图

2004年5月22日于内蒙古大学

前 言

众所周知,没有对最重要的古文献进行语言分析,就不可能研究语言史,不可能查明继承性和早期发展阶段与现代语言的联系。为了恢复语言史,有必要充分记述个别书面文献的语言并特别关注现代语言所继承的特点。

语言的史料学是蒙古学中有前途的方向。研究蒙古古文献对于研究蒙古语比较历史语法和语言科学史同样很重要。

蒙古语言史中的 17 世纪是形成古典书面语的时期。在 17 世纪书面文献当中,编年史《黄金史》引起研究者的特别兴趣。它是有学问的僧人罗布桑丹津写成的,并仅从 1926 年起根据惟一在蒙古找到的誊写本而成了专家们所知晓的^①。

我们是根据 1937 年在乌兰巴托出版的文本(两卷本,共 354 页)进行文献语言研究的。然而,因为业已出版的文本中有许多错字和漏词,所以我们不得不参照 Г·Д·桑席耶夫热情提供的原稿影印本原文校对该文本。

所提供的研究著作乃是蒙古学中首次尝试记载《黄金史》语言的语法特点,主要是静词和动词词形变化的语法形式,以及发现编年史原文语言在与现代蒙古语比较中的基本特点。

在所列举的例句里使用蒙古学中通用的科学的拉丁语音标。页数按照 1937 年的乌兰巴托版本标出。

由于在许多情况下缺乏编年史文本的字母的转写符号及它们不正确的使用,因此在许多例子的标音中便产生了困难。在这样的情况

^①关于这一点请详细参阅“《黄金史》简述”这一节。

下只好遵循该词通用的发音。如果遵循编年史文本,那么只好形译,例如:qaqan 替代 qayan“可汗”,baqatur 替代 bayatur“勇士”、“英雄”,Jaqura 替代 Jayura“在……之间”、“在……间隔中”,等等。

专有名词和地名用大写字母书写,虽然在编年史文本中大小写字母没有区别。标点符号是根据编年史文本打上的。

概 论

蒙古古书面语^①及其发展时期

蒙古文字在回鹘文字母的基础上出现是在 12 世纪末至 13 世纪初,而且至今尚未查明,是哪—个蒙古部落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制了这种文字。

Я·施密特[128,第 243—256 页],А·М·波兹德涅耶夫[63,第 50 页],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24,第 19 页],以及后来其他的研究者[74,第 15 页;104,第 196 页]认为,这可能是乃蛮人和克列亦惕人,他们是住在与畏兀儿邻近的最有文化的部落。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由于坚信蒙古起源于乃蛮和克列亦惕部,因而推测,“显然,蒙古书面语正是在成吉思汗时代之前在这些蒙古部落中产生的”和“成吉思汗为了自己强国的需要才采用了现成的文学语言,一种借助回鹘文字母充分固定下来,表现出来的语言”[24,第 19—20 页]。

作为早先蒙古文字出现于乃蛮部的证明,通常援引广为人知的历史故事:1204 年成吉思汗战胜乃蛮部,俘获畏兀儿人塔塔统阿,他在乃蛮达延可汗处任“掌印官”。在这个“掌印官”的帮助下成吉思汗在回鹘文基础上创制了蒙古文字。

这一说法得到了部分蒙古学家的支持[74,第 14—15 页;115,第 183 页;122,第 7 页]。然而至今任何乃蛮文献尚未被发现,说法本身

^①关于这一点参阅[78]。